一个女生为啥要给校长信箱写信

实习生 文露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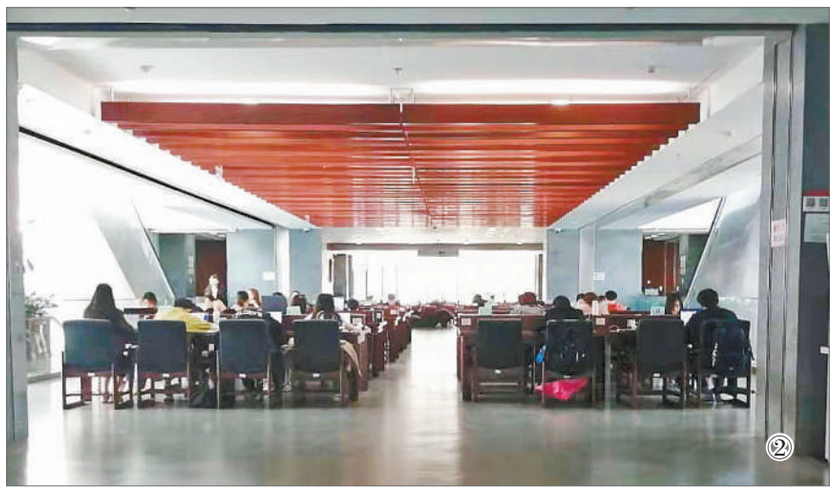
在记不清第几次路过学校图书馆的名人画像后，陈思怡决定做一件事。她要给校长信箱写信，请求增加图书馆大厅陈列的女性名人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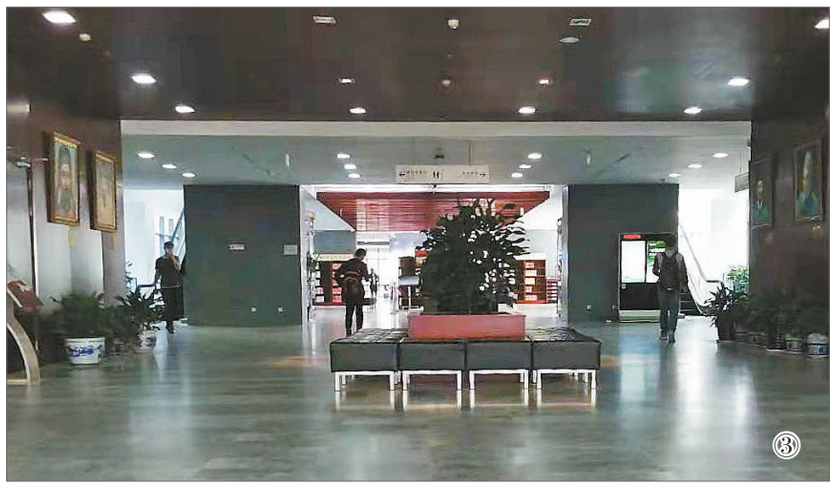
那些画像装裱在金色画框内，沉默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学生，但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们。在某电商平台搜索“名人海报”，会跳出数千条结果。类似的画像，也许出现在全世界无数间教室墙壁和无数条学校走廊上。

2017年，陈思怡入读中国人民大学。学业很繁忙，只要有整段空闲时间，她都会去图书馆上自习。大一上学期的考试周前夕，陈思怡偶然看到同学间流传的一个表情包——“学渣考物理前想拜牛顿，结果拜成莫扎特”。会心一笑后，她第一次注意到，“原来图书馆里有那么多画像”。

那天吃过晚饭，陈思怡又去图书馆。趁这个机会，她仔细欣赏了陈列在图书馆墙壁上的画像。一幅幅看过去，有康德、黑格尔、笛卡尔……找了一圈，陈思怡忽然发现画像上没有女性的身影。她有些失落，但当时她压下了心里的不舒服，“可能只是巧合”。

校园生活平淡地继续着，直到3年后，陈思怡决定，要想办法作出些改变。





①②③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内景 受访者供图

陈思怡拍下并发到校长信箱的图书馆照片。 受访者供图

温和派的“反叛”

进入大四，陈思怡一周只有两节课，空闲时间多了，她有时在图书馆一待就是一天。

陈思怡喜欢去安静的五楼，她计划出国读研究生，忙于实习和申请。2020年11月22日，一个普通的周日晚上，陈思怡在浏览国外高校的相关信息时发现，许多学校都有专门提供给女性学生的奖学金，鼓励她们从事学术研究，比如意大利博科尼大学和荷兰丁伯根研究所。由于此前女性学生的比例达不到一半，丁伯根研究所的官网上还写着，“今年会鼓励更多女性报考”。

陈思怡有些感动。她联想到图书馆的名人画像，觉得现在有时间和精力来“处理”这件事，把这个情况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期望作出些改变”。但同时，这个念头又让她有些迟疑。

陈思怡查了查资料，发现人大图书馆新馆落成于2010年12月底，这些画像比她在人大待得时间还长。这10年间，她不确定有没有人注意过相同的问题，也不确定有没有人付出过行动。她怀疑，“是不是我太敏感了”。

向学校有关部门反映——这件事也不太符合她的性格。在朋友眼中，她一直是个低调的人。她从没有想过要参加定期召开的学生代表大会，比起公开发表意见或与人辩论，她更喜欢收集资料，独自思考。

虽然这些画像并没有让陈思怡“一踏入图书馆就感到非常不爽”，她也能料想到，如果事情公开，有人会觉得“小题大做”，但她又觉得，这件事非做不可。

陈思怡在成长过程中从没有感觉到性别带来的限制或是便利，尽管爸爸和叔叔都只生了一个女儿，奶奶也完全没有责备的意思。家里并没有明确的性别分工，爸爸烧饭的次数比妈妈还要多。

她来自江苏南部地区，家族中有修族谱的传统，但早些年断更了。陈思怡上小学的时候，家里有亲戚提出要续修整个市里“陈”姓一支的族谱。陈思怡的爸爸去参加族谱颁布会，领回“堆起来有桌子那么高”的书。

爸爸告诉陈思怡，她这一代，是家族里的女儿们第一次以完整的名字登上族谱。不再是刘陈氏、王陈氏，或者其他什么氏，也不再只是“生女一人”，而是“陈思怡”。她翻开族谱，看到自己的名字，白纸黑字。那一瞬间，她很自豪。

“这几年人们越来越重视女性的发声，也算一个比较好的时机。”趁着这样的时机，陈思怡决定“反叛”一把，但她也不太清楚第一步要怎么做。她在寒风中走回宿舍，脑海中还没有答案。

需要找“更能推动问题解决的人”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网站综合管理平台“意见与建议”区当时有632页，一页10条。有同学反映“3楼数字阅览区插座没电”“地下一楼太冷”“有人在图书馆吃东西”“占座问题严重”，都得到了简短的答复，但这些问题，怎么看也不像是和“图书馆名人画像没有女性”同类的。

陈思怡也拿不准图书馆画像这事儿属于什么范畴，要向谁反映。周一早上，她早早来到图书馆，在座位上发愁，首先想到曾经关注过的人民大学“性与性别研究社”。这个校园社团经常在学校里组织一些“岔话会”，对性别议题进行讨论，提倡“多元、包容、提升、交流”的理念。建立联系后，社长也很赞同她的想法。

但这件事向谁反馈，陈思怡还没想好。她又向同在人民大学读书的高中学长刘宇飞求助，这位学长有学生工作经验。

刘宇飞此前没有注意过图书馆的画像，收到陈思怡微信的时候，他也觉得“这件事往小了说是对图书馆建设的完善，往大了说，体现了性别平等的意识。”陈思怡说，自己初步计划和校学生会权益部反映，刘宇飞却觉得不太合适。他推测，“图书馆画像没有女性”的问题，偏向认识层面，可能需要找“更能推动问题解决的人”。

他向陈思怡推荐了校长信箱：“身边有些同学之前通过校长信箱反馈问题，最后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2002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在官网上设置了“校长信箱”链接，受理师生、员工和社会各界对学校各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报》1402期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校长信箱平均每天收到的14封有效信件中，校内来信平均5封，约占有效信件总数的36%，内容涉及教学管理、宿舍管理、食堂管理、教风考风、校园网建设、开源节流、后勤建设及安全保卫等校务管理的各个方面。上述来信得到了各位分管校领导和相关负责人的重视，均加以关注、研究解决。”

陈思怡采纳了刘宇飞的建议，她马上打开邮箱开始写信。

考虑到处理信件的老师有可能并不了解实际情况，陈思怡走遍了图书馆4层楼，仔细地数了数每层楼画像的数量：“人大图书馆1楼至4楼有悬挂名人肖像，其中1楼至3楼每层12幅，4楼16幅，共计52幅。”她还认真拍了16张不同角度的实景照片，标注上“1楼北面右手侧”“4楼南面左手侧”的字样，作为附件请老师参考。

略为思索，陈思怡写道：“历史上不乏许多优秀的中外女性代表，比如科学界的居里夫人、王贞仪，文学界的李清照、简·奥斯汀……她们在传统社会中不顾世俗偏见，凭借自己的力量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十分值得我们学习，也值得纪念与肯定。”

没有停顿，陈思怡继续写，“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四同学，我也希望有朝一日，师弟师妹们在图书馆中学习的时候，头顶与心中也有那样一些温柔而坚定的女性形象……顺颂时祺。”

11月23日早上9点10分到10点13分，63分钟，陈思怡一蹴而就，点下发送键。

她把写好的信给性与性别研究社社长和刘宇飞看了看，大家都觉得写得不错。晚上，陈思怡照例给母亲打电话，提到这件事，她开玩笑说：“我最近搞事情了。”母亲问清楚后，说了一句：“挺好的。”

这只是个平常的周一夜晚，那封寄出去的信和信里提到的那件事，陈思怡没再和别人提起过。

如果王贞仪没有害怕，那我也不会

陈思怡等了一个星期。这期间，她还是每天到图书馆，照常写申请、联系实习。她给邮箱设置过消息提醒，心里始终挂念着。周二早上，陈思怡向一位师弟要到了图书馆馆长刘后滨的邮箱，再发了一封邮件。

晚上10点50分，邮箱被馆长的回复唤醒。短短三行字，带给陈思怡很大安慰：“我们将进一步征求意见，综合研究，完善包括名人肖像在内的馆舍空间布局安排，努力把图书馆打造成一个读书人心目中理想的心灵栖息地和完善自我的精神家园。”

收到刘馆长的回复后，陈思怡马上发了个朋友圈，用了“企鹅跳舞”的表情：“希望有生之年，在图书馆学习的时候，不仅头顶有老爷爷们，也可以有老奶奶们呀。”这条朋友圈得到了242个点赞，是她好友人数的四分之一。

第二天，校长信箱的回复让陈思怡再次感到了惊喜。这封回信解释了名人画像没有女性的原因：“建馆初期由校友统一定制捐赠，就按已有的名人像布置了。”这与陈思怡的猜测相差无几。而信的结尾还表示，计划加入居里夫人、海伦·凯勒、冰心、李清照、吴健雄和洛芙莱斯伯爵夫人，“此项工作已过会并开展，正联系专人绘制名人肖像，请静候”。

回复里提到的6个人，最后一个名字陈思怡不认识。她马上去查，发现她的全名叫奥佐斯特·阿达·洛芙莱斯，是世界上第一位计算机程序师。她感到很惊讶，因为在传统观念中，这个职业是男性主导的。

在给校长信箱的邮件里，陈思怡也提到了清代的王贞仪，从高中第一次了解到她起，这个200多年前的天文学家就给了陈思怡很多力量。暑期去英国交换学习的时候，陈思怡还和外国同学讨论过这位被《自然》杂志评为“为科学发展奠定基础的女性科学家”，而陈思怡周围的很多中国同学却不太认识她。

王贞仪生活的年代，女性从事科学研究为时代观念所不容。在陈思怡看来，举起望远镜看见浩瀚星辰的她，是自由而勇敢的。遇到困难的时候，陈思怡会忽然冒出个念头：如果是王贞仪，她会怎么做。在她看来，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陈思怡曾有个网名，叫“花树酱”，性与性别研究社对她的采访中，她使用了这个化名。它来自王阳明的“岩中花树”典故，陈思怡很喜欢它的寓意。

这件事过后，也有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反对陈思怡的做法，但她不是很在乎，因为在她看来，这一提议是正当的。她再一次想到了王贞仪，那个不甘做做花瓶、写写诗词的女性。“我会想，王贞仪当时有没有害怕？如果她没有，那我也不会怎么样。”

从写信到收到回信的过程，一共是10天。而从注意到图书馆画像到向学校成功提议，陈思怡用了4年。一个同在人民大学读书的女生说，等图书馆真正把女性画像挂到墙上的那天，她要去合影留念。

陈思怡可能不会去拍照。“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小插曲，做完了就结束了。”她原本做好了“这次不行，就等待下一个时机”的准备。她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也不想用一种很激烈的姿态去要一个结果。“但无论如何，最后一定要把它完成。”

“等我成为人大老校友的时候也行。”陈思怡带着些开玩笑的语气，“10年不行，就20年。”

进展很快就来了。

2021年3月8日，在第111个国际妇女节之际，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发起了一项投票，为“增加图书馆内女性名人肖像”，征集读者意见。入围女性共16人，她们为人类作出贡献的领域包括文学、艺术、科学、公益等，有李清照、王贞仪、林巧稚，也有阿达·洛芙莱斯、阿加莎·克里斯蒂和蕾切尔·卡逊。

这条推送在最顶端的位置贴了一张卡通与实景结合的图片——一个小姑娘，指着图书馆墙上爱因斯坦、牛顿等男性名人的画像，配文：“人类历史上，男性与女性通过科学与人文创造，共同点亮了世界文明的熠熠星河。”

4月6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收到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信箱回复，增补的女性画像已进入绘制阶段，工期预计4-5个月，“届时所有拟增加的画像会同时展出”。

陈思怡默默关注着画像更换的进展，在之前的投票中，她还在朋友圈为王贞仪拉了票。得知画像最早也得在数月后更换，快毕业的她有些遗憾：“我应该见证不了那个历史瞬间啦。”

（应采访对象要求，陈思怡、刘宇飞为化名）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文章截图

一颗棋子 跳出重围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焦晶娴

在43岁这年，王晓明的棋子落下了重要的一步。

被先天性肌营养不良症困在床上38年后，他终于搬离了位于上海浦江镇知新村的父母家，如愿开始了独居生活。他的身体离不开护理床，除了两只手的食指和拇指，四肢因为逐年加重的肌肉萎缩丧失了运动功能。

王晓明是一名围棋教师，不过他不用和学生见面，是通过网络直播间里的虚拟棋盘推演棋局，同时进行语音讲解。5年前，他在网上创办了自己的围棋培训班。目前，85名棋童考上业余五段，从他这里顺利“毕业”。

事业的起色是他搬家的原因。父母反对他请护工，他也没有娱乐花销，吃穿住不用自己掏钱，靠重残补助也能活下去。在父母家安逸的环境里，他撑不住连上八九个小时课的劳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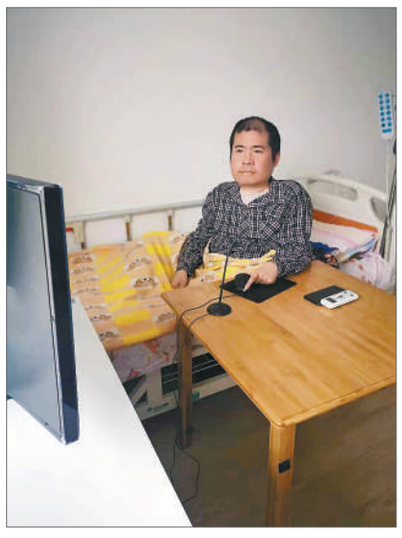
他之前查过资料，得了这种病的人平均只能活到20多岁。活到43岁，他觉得可以开始做些计划。离开父母，独立生活能给他赚钱的动力，他也能专心搞教学，或许还有机会干出点事业。

多数家长只知道这位老师的声音“年轻又洪亮”，并不知道他上课时，把鼠标放在用了几十年的木盒子上，用右手拇指内侧那块珍贵的肌肉控制鼠标，让棋子准确地落在棋盘上。木盒子就搭在腿上，如果放得太远，手臂会不受控制地滑落。

他从14岁时开始下围棋，黑白色的棋子承载着王晓明丰富多彩的生活。他生下来走路总是摔跤，摔了就爬不起来，5岁的一次手术后，“人生中能站立行走的记忆到此结束”。他多年来出门的次数一只手就能数过来，去过最远的地方是上海市中心的医院。

下了30年围棋，棋盘上361个交叉点，王晓明知道当棋子被逼得只剩一口气时，需要派救兵帮它杀出重围。但当生活把他逼入那间狭窄昏暗的老房子时，他能做的反抗并不多。

王晓明的学生们 受访者供图



王晓明

他的家庭并不富裕，父亲作为建筑工人常年在外奔波。整个家全靠母亲操持，有时她还要在村里接些扫马路之类的杂活。王晓明很少向父母提要求，20岁之后连出门晒晒太阳也没提过。

他翻过一两本电器维修的书，但乡下没有器材供他实际操作，他也无法出门寻找师傅。他喜欢在纸上涂抹颜色，绘画课在5公里外的外婆家旁边，他去外婆家串门的时候上了两天，因为父母没时间接送就再也没去过。电视剧里飞檐走壁的侠客还曾让他痴迷于武术，“很多事不是喜欢和不喜欢的问题，喜欢也没用。”

他喜欢看户外直播，以此慰藉他环游世界的梦想。318国道川藏线的风景看了一遍又一遍，但现实中他习惯了闷在屋里，角落里的轮椅都生了锈。

10岁前，他还能用上肢残存的力量，把身体从一个凳子挪到另一个凳子上，以实现小范围的移动。12岁后，肌萎缩加剧，脊柱向后凸起，他再也没下过床。哥哥和小伙伴都去上学的时候，他独自一人在昏暗的角落探索生活的可能性。

他没有上过一天学，只通过识字卡片和哥哥借来的课本自学到小学四年级。但他的谈吐和阅历很难让周围人把他和“没文化”挂钩，搬家后照顾他的护工张平有初中文凭，平时他总聊起国内外时事和书籍，张平觉得“他什么都知道，感觉我像是文盲。”

“我在智力类游戏上总能胜过同龄人。”他在棋牌类游戏中找到了战胜对手的快乐，刚接触围棋时“瞎玩也能赢”。邻家哥哥那本介绍棋类训练方式的书，让他开始“想干出点名堂”。

研究一盘高手对局通常要花上四五个小时甚至一两天。独处的时间原本多得难熬，但当思绪倾注在横纵十九路的棋盘上，时间开始飞快流动。

不到一年，村里就没人下得过他，“没有机会赢，当然也没输过。”少年心性让他迫切地想知道自己还能闯多远。

一台5000元的电脑，是他24岁前唯一说出口的心愿。2002年夏天，父亲把电脑买了回来。头半年只能拨号上网，他把时间精打细算，一周4个小时，都留到周末网上人多的时候去“杀上两盘”，在各大围棋网站上一路升至“九段”。

在网络世界里，他还是弈城棋友会“斧头帮”的第四任“帮主”，大家都喊他“老大”。一位和他下过两局的体育记者评价他“风格很凶”“能反击的时候一定会反击”。

棋友会就像网络围棋江湖里一个个各自为战的部落，对围棋的热爱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刚进棋友会的两年，他严格把守着自己身体的秘密，只谈围棋不谈生活。

他第一次破例是对一个女孩，在女孩的刨根问底下，王晓明告诉了她自己的情况。后来他发现，女孩儿其实也是有视力缺陷的残疾人。两人越聊越多，女孩成了他的初恋。

有棋友给他介绍学生，下两个半小时的指导棋，他只收30元钱。他不在乎钱多钱少，“既然做就要做好”。因为他态度认真、效果也好，学生越来越多，教学收入从一个月两三百元变成如今每月一两万元。

由于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他的身体出现褥疮，股骨头彻底坏死，脊柱也越来越弯。“离开网络的话，可能会对我的身体好一点，但那就只能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在新家里，他坚持自己能做的自己做。白天吃饭，他让护工张平帮他把胳膊放在桌子上，用两个能动的指头捏着筷子夹起菜，再伸头出去够。但晚上睡觉，身体每隔一个小时就会麻掉，他需要呼喊旁边的张平帮忙翻身。

他也知道，得了这个病，“做太长远的打算也不现实。”目前的目标就是今年毕业的孩子能从85个达到100个。

越来越多的棋友知道了他的事，坐着火车结伴从外地来看他，其中一位直到现在还坚持每年来帮他维护电脑。一位家长从2015年就认识他，两家之间距离不到1公里，“有时候和儿子散着步顺路就去了”。去年“十一”假期，10多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去他的新家拜访，把王晓明不到20平方米的卧室挤满。

他时常感慨自己生在了“科技爆炸的年代”。在他快迈过30岁的坎儿时，肌肉萎缩剥夺了他敲击键盘的权利。从那以后他改用屏幕键盘，最近两年也会结合家长推荐的语音输入法。

唯一不方便的是打电话，光是滑动接听就很费力。他笑称买智能手机只是“赶时髦”，里面只有微信和支付宝。

搬出来后，王晓明的时间被教学填满。空闲时间里，他担心疫情影响下的生源，担心自己生命的长度。他幻想自己如果回到20多岁，一定会爱惜身体，“之前好多事不敢想是因为没钱，现在赚了点钱身体又太差了。”之前身体只是束缚他的壳子，现在他还想用这个壳子看看外滩的风景。

他努力让自己更忙一点，就像30年前一心扑在棋盘上的那个少年，努力抓住一口气，躲避命运的围堵。